

【本刊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九月二十三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印度宣扬和平，而干的是另一回事》，摘要如下：

印度于九月初兼并锡金这个小小的喜马拉雅山王国，再次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经常向世界其他国家宣讲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如何邪恶的国家。

批评印度的人坚持认为，如果把印度历来的言和行作一番对比，就会出现一幅令人不解的图景。

他们指责说：印度宣扬非暴力，但是它对于使用武力来达到自己认为重要的国家目的，却是极少犹豫的。它在镇压国内不同意见方面，有着采取残酷手段的记录。它是反殖民主义的，但却使用了自己的军队来重画次大陆的地图。这些批评者中的许多人说，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是亚洲最贪得无厌的殖民主义国家。

摆脱殖民地地位后的历史。自从印度一九四七年获得独立以来，历史的记载表明了什么？

克什米尔。在这个山地，四百万人口中大约百分之七十五是穆斯林，他们的统治者是大君哈里·辛格爵士，是锡克教徒。

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宣称克什米尔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文章

《印度宣扬和平，而干的是另一回事》

是属于自己的。克什米尔是英国这个正在消逝的殖民国家曾说过可以加入这两个新成立的国家中的任何一个、也可以独立的五百个土邦之一。一九四八年，西北边境的部族人——是穆斯林，可能得到了巴基斯坦的支持——攻入克什米尔。哈里爵士向印度求援，新德里说，“不行”，除非他首先同意加入印度联邦。他同意了这样做，于是印度军队越过边界开入克什米尔，把这些部族人赶了回去。印度领导人曾答应举行公民投票，但是几个月内，他们就同巴基斯坦为克什米尔打起来了。巴基斯坦仍然希望克什米尔人民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印度说，克什米尔正式属于印度。

朱纳加德。这个邦——比美国的康涅狄格州稍稍小一点。八十万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印度教徒，但是其统治者——朱纳加德的纳瓦布（意即土王——本刊注）——是一个穆斯林。他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加入了巴基斯坦。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九日，印度

陆军部队开进了这个土邦。

海得拉巴。一九五〇年，新德里政府一本正经地对尼扎姆（海得拉巴士王名——本刊注）说，他必须加入印度。然而他却希望海得拉巴独立。于是，印度执政党国大党就派了煽动者到海得拉巴去组织大规模的不服从运动。少数民族穆斯林拿起了武器，印度就派遣军队去恢复秩序。海得拉巴就此并入了印度。

果阿。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要求法国和葡萄牙放弃它们在次大陆的殖民地。法国撤出了本地治里；葡萄牙则拒绝离开果阿。果阿是一块面积一千四百二十六万六千人的小飞地，人口大约六十二万六千人。印度领导人说，果阿威胁了印度，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印度军队出兵占领了这块飞地，葡萄牙人没有进行什么抵抗。

孟加拉国。一九七一年因当时的东巴基斯坦反对残暴的军人统治而发生的一次骚乱使大约一千万难民蜂拥越界进入印度。十一月间，印军越过边界，粉碎了巴基斯坦军

队，于是诞生了独立的孟加拉国——在印度的支持下。

锡金。二十四年前锡金曾同印度签订过一项条约，条约承认锡金自治，但是让印度控制其通讯、防御和对外关系。

该条约规定，“印度政府有权在锡金境内任何地方驻扎军队……（锡金）不得同任何外国往来”。

许多印度人对这一条约的措辞感到吃惊。

接着，锡金的党派斗争成了一个因素。二十万锡金人同锡金统治者——国王帕尔登·顿杜普·纳姆加尔和他的美国妻子霍普·库克——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民族间的暴力行动扩大了，国王在一九七三年向印度求援。已经驻在锡金境内的印度军队控制住了这种混乱局面。首都甘托克的印度官员起草了一部剥夺国王权力的新宪法。

一九七四年九月，印度议会以压倒多数决定修改印度宪法，以使锡金能成为印度的一个“联系邦”，派遣两名选举产生的代表参加新德里的议会。新德里的《印度斯坦时报》评论说：“没有任何国家或民族自愿选择自我勾销；而印度不可能说服世界相信‘吞并’锡金代表了锡金人民的意志。”（下转第三版）

菲总统马科斯向全国发表讲话

宣布菲将签署一项向中国购买石油的协定
说他的夫人访华为菲开辟了一条新的外交战线

【美联社马尼拉九月二十一日电】马科斯总统今天宣布，菲律宾将签署一项向中国购买石油的协定。

马科斯在实行军管两周年的时候对全国发表讲话说，他的夫人伊梅尔达将在目前访问北京期间签署这项协定。

马科斯在他的总统府发表的一篇讲话中说：“我们的政策将是同人类的这一部分人交往，由于思想上的原因，我们一直没有能够接触他们的市场、资本和技术知识。”

他说：“寻求我们出口的新市场和贸易的新来源、经济援助以及同我国的邻国合作，必须以外交先行。”

马科斯说，对于共产党的叛乱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必须加以区别，对共产党叛乱，“我们正在国内尽力加以平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正在努力对各国间的合作作出贡献。

在马科斯讲话之前，政府权威人士预料，贸易逆差高达五亿美元，比他在讲话中再次提到的三千八百万美元多得多。

马科斯在讲话中说，这国家必须增加出口收入百分之十五。他还下令结束借外债的情况。

【合众国际社马尼拉九月二十一日电】马科斯在马拉坎南宫发表的即席讲话中说，随着第一夫人正在对中国进行亲善访问，菲律宾已开辟了一条新的“外交战线”。他说：“我确信，为使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正常化而采取的这些步骤会改善我们的贸易和军事安全的情况。”

委内瑞拉总统谴责福特在联大的讲话

【法新社加拉加斯九月十九日电】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今天晚上打了一封措词有力的电报给美国总统福特，电报说，在国际关系中的不正常情况是来自于工业化世界对不发达国家的作法。

佩雷斯的电报是回答福特昨天在联合国的讲话的，他在讲话中威胁石油国家说，如果原油价格继续上涨，就要使用粮食“武器”。

佩雷斯说，“几十年来，我们拉丁美洲一直坚持要求发达国家、当然首先是我们的邻国和传统的朋友美国给予公平合理的待遇”。

这位总统说，“我们一再指出，我们这些国家由于被迫作为美国经济的支流而怎样贫穷化”。他接着强调说，“为了进口机器和其它制成品，我们咖啡、肉类、锡、铜、铁和石油生产国付出了我们的大

量产品，造成了我们这些国家连续不断的越来越严重的资本缺乏和贫困”。

他说，在拉丁美洲“和在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我们可以断言，发达国家一直在侵犯拉美人、亚洲人或非洲人的基本需要”。他接着说，“以委内瑞拉为例，在许多年中，石油

价格不断下跌，同时我国不得不以越来越高的价格购买美国的制成品，这就愈来愈限制委内瑞拉人的幸福”。

这位委内瑞拉国家元首强调说，“这些天来，我们看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拒不接受公平合理的咖啡价格，从而使国际咖啡组织处于无所作为的状

美新处报道《福特和葛罗米柯讨论美苏关系》

白宫发言人说福特盼望勃列日涅夫一九七五年访美

【美新处华盛顿九月二十日电】题：福特和葛罗米柯讨论美苏关系

福特总统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举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会谈，葛罗米柯目前在美出席联大会议。一位白宫发言人说，这次会谈“在语调上是亲切的”。

他说，会谈的主要部分是讨论美苏关系，其中包括自从六月份尼

克松同勃列日涅夫举行最高级会议以来所发生的事情。他指出，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即将出现的问题，以及战略武器会谈、欧洲安全会议和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会谈等问题。

他说，此外，还研究了中东局势，“两人一致认为为了实现中东持久和公正的和平而继续作出努力是重要的”。有人问由于总统同

况”。“拉丁美洲和非洲咖啡生产国的外汇收入损失了近百分之三十，而来自发达国家的制成品价格却上涨了一倍或两倍”。

委内瑞拉总统认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别的对付经济极权主义的道路，这种极权主义已攫取了世界贸易谈判的领导地位，并且旨在给世界制造很有害的东西，就象纳粹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极权主义企图作的那样”。

葛罗米柯外长和杰克逊参议员举行了会谈，总统对过这项法案是否抱有较大的希望，这位发言人说，“总统肯定是抱有希望的，但是我不想在这些问题上说出具体的时间”。

他还说，福特先生“盼望”苏联共产党主席勃列日涅夫于一九七五年访问美国。

参加会谈的有基辛格国务卿。

南斯拉夫联邦检察院发表公报

宣布结束对从事反南活动分子的审讯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九月二十日电】题：联邦检察院公报
联邦检察院今天发布了如下公报：

对从事反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宪法体制和独立的活动的非法集团成员的审讯业已结束。

佩奇和铁托格勒有关司法机关审判委员会，对以住在佩奇的养老金领取者科·约沃维奇和普里什蒂纳的教授布·博什科维奇博士为首的三十二名非法集团成员，所犯的结社反人民反国家的罪行进行的审讯业已结束。

受审判的非法集团的目的，在于组织起来，从事反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制度的敌对活动，并在我国建立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背道而驰的社会政治制度。

该受审判的集团的代表曾与在国外从事反对我国的活动的情报局流亡分子有联系，并从他们那里接受任务和宣传材料。

该非法集团的成员举行了会议，通过了“章程”，并组成了“领导机构”，而所有这一切目的都在建立自己的组织。在逮捕这些人时，在他们那里发现并缴获了大批内容敌对的宣传材料和其他材料。

上述法院宣判（二十九人）严厉监禁二至十四年，宣判（三人）监禁一年。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九月二十日电】题：南通社评论

联邦检察院今天发布的关于审判从事反对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宪法体制和独立的活动的非法集团成员的公报，对于这是什么样的敌对活动这个问题没有留下怀疑的余地。

我国公民中同极端的情报局流亡分子相勾结的一小撮人，想要成立什么“新党”。这里指的是佩奇的二十七名罪犯和铁托格勒的五名罪犯。

情报局的活动早就被揭露是卖国行径了。以前的情报局分子中，大部分人多年来吸取了教训，但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隐藏起来了，并开始同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六月二十二日刊登罗·凯泽发自莫斯科的一则报道，标题为《享有特权的苏联人：一种不同的、更为舒适的生活方式》，摘要如下：

在苏联，有一群人的生活方式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几乎毫无共同之处——这群人就是享有特权的一小撮高级官员、科学家和艺术家。

对那些最上层的人来说，不必排长队，不必行贿和付小费，不会受低级官员的干扰，不住过分拥挤的住房，不缺乏消费品。他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

在俄国，这些人就是“纳恰尔斯特沃”，这个字眼具有讽刺味道，照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指“当局”，但是真正的意思更多的是指“大人物”。

一个工人悲哀地望着——一辆长长的、漆黑的轿车在莫斯科的库图佐夫大街中间疾驶而过。他说道：“纳恰尔斯特沃从来也不知道我们其余人是怎么生活的。”汽车里坐着苏联最重要的公民之一，汽车把他载往他在乌斯宾斯基路的一座宽敞的别墅里去。

格拉诺夫斯科沃大街上常常停着一长串海鸥牌和伏尔加牌黑色轿车。全都配备司机驾驶，它们是纳恰尔斯特沃坐的汽车。他们来到位于这条大街的一个专门的百货公司买东西。这家百货公司设在一座大楼里，大楼门前的牌子上写着“特别通行证机关”。

这家百货公司出售食品。这些顾

马卡里奥斯结束对阿尔及尔访问抵达开罗

南通社报道马卡里奥斯向南报发表的谈话

【中东社开罗九月二十日电】塞浦路斯共和国合法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今晚八时半到达开罗，萨达特总统到机场迎接了他。马卡里奥斯将对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进行两天访问。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机场发表声明说，感谢上帝使他经受了这一次考验。他表示希望塞浦路斯稳定下来。

【法新社阿尔及尔九月二十日电】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结束了三天的访问后，于二十日中午离开阿尔及尔。他在访问时同布迈丁主席会谈了塞浦路斯问题。

马卡里奥斯向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同时也是不结盟国家集团的执行主席，阐述了他对恢复塞浦路斯秩序和平的符合宪法的解决立场。

【法新社阿尔及尔九月二十日电】马卡里奥斯在离开阿尔及尔前

单一政府主义分子、官僚教条主义分子和兰科维奇分子以及反对南斯拉夫独立、社会主义自治和各族人民平等的其他敌人勾结起来。他们总是在南共发起重大战斗的时候加强其反革命活动的。

容忍这种活动是不能令人接受的。这种活动不仅是针对我国的，而且还是针对国际关系、国家间合作与友好交往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的。

往开罗之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在所有外国军队撤出（塞浦路斯）岛之前，我不回塞浦路斯。”这位塞浦路斯国家元首宣布要“所有外国军队，包括英国军队在内，从塞浦路斯撤走”。

【本刊讯】阿尔及尔九月二十日消息：马卡里奥斯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对不结盟国家的信任超过对大国的信任。不结盟国家

【本刊讯】意《人民报》九月十九日刊登

如下一条消息：

土耳其外长居内什昨天早晨由安卡拉抵达罗马。昨天早晨莫罗和居内什在法尔内西纳宫举行了会谈。在长时间和亲切的会谈中，他们研究了塞浦路斯危机的事态发展。

意大利方面再次表

示，

土耳其外长居内什说，在此之前，他同北约秘书长伦斯在土耳其驻这里的使馆“深入地讨论了土耳其和北约的共同利益”。他对记者说，土耳

坚持原则，而且它们在塞浦路斯没有任何利益。我对那些大国是否严格遵守自由、正义和人的尊严的原则有些怀疑。”

“我们的努力是恢复宪法秩序。俄国人不是外人，他们没有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任何建议，而只是对促进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的办法提出了建议。”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九月十九日电】塞浦

土耳其外长居内什访问意大利

居内什谈土与希腊和共同市场的关系等问题

其愿意本着“非常坦率的精神”谈判由塞浦路斯引起的所有问题。分界线是可以谈判的，减少土耳其军队的事可以考虑。但是，需要双方都抱有诚意。正在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会议途中的居内什说，在纽约同希腊外长马夫罗斯举行的会谈“有可能，但不一定会”推动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

【法新社布鲁塞尔九月二十日电】土耳其外长居内什今天在这里的一次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记者说，土耳其希望希腊能回到北约的军事组织中来。

居内什说，在此之前，他同北约秘书长伦斯在土耳其驻这里的使馆“深入地讨论了土耳其和北约的共同利益”。他对记者说，土耳

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在他访问南斯拉夫的前夕向《政治快报》发表谈话说，他相信不结盟国家能够对公正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起到十分建设性的作用。马卡里奥斯总统特别对铁托总统和南斯拉夫因其对塞浦路斯采取的立场和为公正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作出的努力表示尊敬。

马卡里奥斯总统接着说：“我期望，在联合国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时，所有不结盟国家将联合行动采取一致的立场。这在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解决办法中将是巨大的贡献。”

其愿意本着

“非常坦率的精神”谈判由塞浦路斯

引起的所有问题。分界线是可以谈判的，减少土耳其军队的事可以考虑。但是，需要双方都抱有诚意。正在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会议途中的居内什说，在纽约同希腊外长马夫罗斯举行的会谈“有可能，但不一定会”推动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

关于土耳其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系，居内什说，土耳其还要再过几年才能具备成为共同体正式成员的经济条件和经得住欧洲工业化国家的竞争。

地方官员可从莫斯科得到新的外国影片的拷贝，这些影片是不公演的。邀请谁来观看这种禁映片是由地方官员来决定的。

（据莫斯科的放映员说，这些影片在高级官员的别墅里的放映室内放映。）

有的人年纪轻轻就享有特权了。在最近举行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选出的代表和客人被邀请到一家专门的服装店，他们在那里可以买到时兴的西方服装，这是苏联社会中人们渴望得到的表明地位的象征之一。

使外国观察家感到震惊的是，他可以发现特权制的各种细微末节。一个鼓吹平等思想的社会竟然鼓励阶级特权，这一点看来可能是令人难堪的，但是特权制并不是国家的什么机密。人人都知道一些关于特权的情况。莫斯科的知识界成员知道不少。国家并没有作特殊的努力掩盖真相，甚至也没有把专门商店设在考虑周到的地方。

如果特权制保持秘密，也许它起不了适当的作用。纳恰尔斯特沃可能希望人们知道，凡是为保卫和促进苏维埃政权而出力最多的人就可得到好处。特权制的最惊人的方面就是它的渗透性。

特权阶级可以通过俄国人所谓的特别“渠道”得到他们需要的几乎一切东西，从一所避暑别墅直到一张火车票，应有尽有。（下转第四版）

美报报道《享有特权的苏联人》

客拿着包装奇妙的大包小包食品钻进了他们的汽车。

在首都各地散布着为特殊人物服务的其他专门机构。在《华盛顿邮报》莫斯科分社正对面，有一家为苏联政府——部长会议高级官员开设的裁缝店。

他们可在那里定做服装（或为他们的夫人定做一件大衣）。这家店里的裁缝要比大多数裁缝高明，里面出售的料子也是人民群众买不到的。

今天，特权制度是苏联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制度就是严格的等级制度。所有的人中最有特权的就是共产党政治局委员。

他们的薪金多少，别人不知道，但这很可能是毫无关联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取决于特权，而不是取决于收入。

在他们下面，开始按次序排列。到底谁占优先地位，公众不知道，但是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府各部部长在最上面。最高苏维埃或议会的官员也是如此。

特权并不只有最上层的人享有。数以千计的官员都可以享受到——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莫斯科几十个政府部门的重要官僚，

高级科学家和演员，州的党官员和其他许多人。

各个等级的特权略有差别。享有特权的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地位越高，待遇越好。一位副部长最近向一个外国熟人骄傲地谈到他的新的公寓住所——显然是一种特权。但是他接下去说，他的妻子很恼火，因为他们住了三个月还没有安装电话。

在某些机构——保安警察可能是最好的例子，不仅仅最高级官员，几乎所有的雇员都享有特权。

象在莫斯科一样，各州首府也设有特权制。据亚美尼亚的一位科学家说，当地的一家“不开放的配给商店”在大节日的前夕按照配给证出售特殊商品。譬如，一位党的高级官员得到的一张配给证可能使他有权想买多少鱼子酱就买多少（价格适中），而一个较低级的官员的证件，只允许他买三百克鱼子酱。

一个州党委第一书记可以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授予别人各种特权。例如，他控制着私人汽车的分配，他想给谁就可给谁。一个州的记者说，他发表了一篇当地的第一书记认为是奉承的文章，他不久就得到了买一辆俄制菲亚特牌汽车的机会。

【本刊讯】贝鲁特《事件》周刊九月六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俄国犹太人来了》，摘要如下：

一位对犹太人迁移问题有研究的老资格的阿拉伯外交家曾说，“在政治力量的角逐中，道德和不道德的手法同样使用”。

当让他进一步阐明时他说：“我研究了苏联对犹太人迁移问题的态度的变化，进行了统计，我发现一个为许多事例所证实的科学事实，我发现，俄国对犹太人迁移问题的态度，除莫斯科需要美国的财物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内容：它取决于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的态度。在我们面前有这样一公式：每当阿拉伯和苏联的关系一下降，莫斯科就打开迁移的水龙头，这种关系一改善，苏联就关上它”！

确凿的事实是很多的！

一九七四年初，已有意地减少了迁移者的数字。在这一年的头两个月，迁移的平均数字与一九七三年同期相比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这个数字是苏联发表的，因为它想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它有意地减少了犹太人迁移的平均数字！这正是在以色列与埃及、叙利亚之间脱离接触问题出现困难的时候。苏联认为，这两个阿拉伯国家将拒绝美国的和平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从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〇年，正是阿拉伯—苏联关系、特别是埃及—苏联关系的黄金时代，在这期间，从苏联迁出的犹太人没有超过一千三百人。

接下来的几年，阿—苏关系上出现了一种急转直下的情况。

黎《事件》周刊文章《俄国犹太人来了》

一九七〇年，埃及根据罗杰斯的倡议刚一接受停火，以色列同年年底就宣布，它接待了九千名从苏联迁来的人！

一九七一年发生了苏丹共产党搞政变的阴谋，在埃及打击了权力中心，苏联认为这两起事件都是针对它的，于是俄国向以色列迁移的人数就达到一万五千人！

一九七二年俄国专家被赶出了埃及，迁移的人数提高到三万二千人！

到一九七三年，阿拉伯人指控俄国和美国达成协议冻结不战不和局面，于是水龙头便完全打开了，迁移的人数达到三万五千人，光是在战争期间就有四千五百个犹太人得到去以色列的出国签证！

在关系恶化的年头

以前，以色列企图打破苏联对犹太人封锁的每一个尝试，都被俄国和阿拉伯间的牢固友好关系所碰回！这是否意味着苏联向阿拉伯人提出了条件：就是要搞好他们和苏联的关系，以便关上这个水龙头呢？

阿尔及利亚《圣战者日报》评论犹太人从俄国迁移的问题时说，这是“在阿苏友谊脊背上插进了一刀”。

毫无疑问，俄国的犹太人已经来了，用什么办法来对付这一激流呢？

向以色列移居犹太人的问题，是注定要阿拉伯人背上的一个十字架！他们最终必定要对付它，并用它来从根本上对付犹太复国主义。因为向以色列移居犹太人是驱逐阿拉伯人和使巴勒斯坦犹太化政策的

之一是扩大印度和美国的贸易。

【法新社华盛顿九月十九日电】白宫的一位发言人在印度外长斯·辛格对总统作了一小时的拜访后说，福特总统表示支持“继续加强印度同美国的关系”。

这位白宫发言人还说，福特总统和辛格都“在期待基辛格国务卿”下个月到南亚访问。

基辛格国务卿打算在十月末或十一月初访问印度以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印外长辛格谈他同福特会谈情况

【印报托华盛顿九月二十日电】印度外长斯·辛格昨天在白宫同美国总统福特举行了会谈，并且同总统就双边关系以及国际形势进行了四十五分钟的讨论。

斯·辛格在同福特总统讨论之后对记者说，对政治和经济问题都进行了讨论。他说，他认为，总统的反应是坦率的和愉快的。他说：“我对这次会谈感到满意，因为他对问题

的态度是积极的和有帮助的。”

辛格说，印度次大陆的问题正在各国之间通过双边讨论予以解决，总统对此表示赞赏。

斯·辛格在回答问题时说，对印度次大陆如何出现稳定局面的问题，印度和美国之间的态度是一致的。

记者问，是否讨论了向印度提供粮食援助的问题，这位部长回答说，总统在联合国大会

上发表了关于美国愿意帮助一些国家增加粮食生产也愿意提供粮食的讲话。没有进行具体的讨论。美国知道印度的粮食情况。他说：“我们已经从美国购买了大量粮食，我们将设法从其他国家得到所有能够得到的粮食。”

斯·辛格说，在讨论中没有谈到中央情报局在智利进行秘密活动的问题。

他说，谈到的问题

在为独立而战，尽管新德里也允许他们单独建立一个邦。

——印度武装部队的人数仅次于苏联、中国和美国，居世界第四位。印度今年的军事预算达二十四亿美元，约占全国预算的百分之二十。

——印度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进行了新德里所说的“和平核爆炸”，从而进入了世界“核俱乐部”。这个原子装置所用的钚是加拿大提供的一个供研究用的小型反应堆生产出来的，因而渥太华抗议说，这违反了一九七一年两国签订的协定。

令人不解的是新德里在国内经济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却继续在军事力量和核力量上花费大量开支。专家们估计，有两亿即百分之三十五的印度人生活于贫困线——相当于每年六十美元——以下。印度失业人口总数可能达二千万人——大多数是在农村地区。

据世界银行估计，印度今年将需要十四亿美元的外援，这是个新纪录。最大的几项是购买高价石油和肥料以及要从美国进口三百万吨小麦。但是为了保持各工业部门的运转，还需要购买机器配件和原料。

尽管如此，印度领导人却仍然极力谋求国际上承认它不仅是亚洲大国而且是一个世界强国。他们的要求——一度主要是以自称的道义上的优势为基础的——现在是在其露骨的军事力量和核力量为基础的。

要有说服力的回答。

基本的问题：促使苏联作出打开向以色列移民之门的决定的真正理由是什么？

苏联为什么在它发表支持抵抗运动、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建立一个巴勒斯坦人民的祖国的权利等等一系列声明的时候打开移居犹太人的大门？

是否有这种可能，即在苏联把赌注押在抵抗运动身上的时候，它正在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相勾结？

苏联在使巴勒斯坦革命遭受失败中得到了什么好处？

在犹太人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其比例达到百分之八十五比百分之十五，即在二十五年之后已经有七百到八百万犹太人的时候，哪里还将会有一个世俗的民主巴勒斯坦国呢？

阿拉伯方面应该回答：当这个问题正发展到比占领阿拉伯领土更为严重更为重大的情况下，阿拉伯人对此问题掌握些什么材料？

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同苏联关系很好的阿拉伯国家是否研究过这个问题？

【路透社伦敦九月十七日电】大赦国际在今天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报道，在印度西孟加拉邦有数千名政治犯自一九七一年以来，未经审判就被囚禁在非常拥挤的环境里。

由这个设在伦敦的人权组织发表的九页长的报告说，有些犯人戴镣铐一直戴了两年。

估计在西孟加拉邦囚禁了一万五千至二万名所谓的纳萨尔巴里分子，其中许多人指责看守和警察对他们进行酷刑拷打。

所谓“纳萨尔巴里分子”被认为是印共（马列）的党员或支持者，他们鼓吹以武装斗争来实行社会和政治变革。

大赦国际说，因为他们犯有暴力行为。但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只是同情者，并没有触犯刑律，却也未审判即被囚禁。

大赦国际说，这份报告已于今年六月交给英迪拉·甘地总理，但是没有得到答复。

【德新社伦敦九月十六日电】在西孟加拉邦的四十六名犯人为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而进行绝食斗争以后，大赦国际提出了一份报告，其中说，犯人的生活条件违反了联合国规定的最低标准。

印抵赖虐待“犯人”的罪行

【法新社新德里九月十七日电】政府人士今天批驳了大赦国际最近的一项报告，说它是“毫无根据的”。这项报告说，拘留在西孟加拉邦监狱里的纳萨尔巴里分子受到了虐待。

这些人士还说，犯人的人数只有一千六百

零九人，不是象大赦国际报告中所说的有一万到二万人。

这些人士否认西孟加拉邦监狱的生活条件差。他们说，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糟糕，政府现在正在考虑进一步全面改善印度监狱的生活条件。

印政府残酷迫害被囚禁的「犯人」

（上接第一版）

外交上自相矛盾的现象。自从独立以来，印度一贯鼓吹“各国人民和各民族自决的原则”。它要求裁军和“禁止制造和使用核武器”。它敦促各国“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然而印度对外政策的记录表明了下列情况：

——印度同巴基斯坦打了三次仗——第一次发生在一九四七年两国争取独立的艰难时期；第二次在一九六五年，又是为了克什米尔问题；最后一次在一九七一年，这次战争导致了巴基斯坦的肢解和孟加拉国的建立。

——共产党中国同印度之间在西藏边界上进行的历时八年的“笔墨战”，在一九六二年印度试图开进中国控制的有争议的边境地区之后爆发了真正的战争。印度被打得落花流水。结果中国军队占领了印度几大片地方。后来他们又撤出了。

——新德里主张使印度洋成为“和平区”，但是它又同俄国有条约关系，规定一旦印度卷入了战争两国将共同磋商。俄国在印度没有军事基地，但是它的海军在那里有登陆权。莫斯科是印度的新式武器的主要供应者。可是印度却抗议美国在迪戈加西亚建立基地。

——二十年来，那加部族一直在印度东北偏僻的边境地区对印度军队开展游击战。印度最后于一九六四年答应那加人成立一个邦，但是起义仍然继续发生。另一支山区部族人，米佐族，仍

科尔就其访华答西德《世界报》记者问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九月十九日发表赫茨艾兴罗德同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科尔的一次谈话，题为《北京支持德国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政策》。摘要如下：

问：科尔先生，您在北京的会谈中是否得到这样的印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希望美国从欧洲也不希望它从亚洲完全撤走，因为苏联会立即在政治和军事上填补这两个地方的真空？

答：我完全可以证实这一点。中国对美国人从欧洲过大西洋撤回去是不感兴趣的。

问：您会谈的一个突出结果是，按照您的东道主的看法，苏联在军事上直接威胁的与其说是中国，不如说是西欧？

答：中国政府分析了苏联兵力的部署情况。它的结论是：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中国人的看法是，苏联把四分之三的地面部队布置在苏联的西部，只有四分之一在中国边境附近。针对欧洲的重型武器所占的比例更高，而在远程武器方面的比例是五比一。我的会谈伙

伴认为，由此十分清楚地看出苏联威胁的重点。

问：中国曾声明，“社会主义阵营”不再存在。因为苏联用勃列日涅夫主义要求有对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能也对中国）进行军事干涉的权利，中国上述声明是想使勃列日涅夫主义失去凭藉吗？

答：勃列日涅夫主义是推行霸权政策的一种手段，而霸权政策是针对所有各方的。但是我个人并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方面是十分恐慌的。

问：您在北京发现他们对北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抱什么态度？

答：关于北约，可以肯定，北京对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所着力支持的德国官方的政策是很理解的。对东南亚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态度，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是相类似。

问：您能否详细谈谈中国对俄国的态度？

答：在我的印象中，那种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的原因首先在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所作的互相对立的解释。中国人对苏联的霸

权要求的担心也是重要的。

问：您能否说明，是不是北京推行一项独立的德国政策，还是中国使它同波恩的关系从属于他对苏联的政策？

答：两种因素都有。有利于欧洲统一的顺利发展以及因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地位也相应强大，是符合中国政策的长远利益的。

问：波恩能不能奉行一项独立的对华政策，或者说，德国的对华政策是否只能是我们同苏联一方、同美国另一方的关系的反映？

答：如果我们同北京的关系只是我们同其他国家关系的反映，那末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这对我们的美国朋友来说是根本不适用的。至于同苏联的关系，由于我们在地理上与苏联接近而产生种种问题，我们不能让任何人，也不能让莫斯科来规定我们同谁发展友好关系。

问：中国想和欧洲共同体建立更密切联系的愿望向您提出了没有？

答：北京是这样想的：欧洲国家越是用一个声音说话，对中国来说就越好。

问：因为中国不相信苏联的缓和政策，它是否想对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施加影响？

答：我认为，这不是德国的政策的有价值的起点。我们的起点应该是：赞成缓和，同时尽一切力量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同我们的北约朋友，尤其是美国的密切联系来保障我们的安全。我们在北京获得了对这一点的谅解。

问：中国对德国和欧洲具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答：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在这里用何等决心采取了象德国政策那样的同样的立场。大概可以说，除了在北京之外在欧洲很少几个地方听到了热烈赞成欧洲立即一体化的意见。第二个要点是一个德意志民族的问题。北京主张一项不折不扣地符合我们利益的政策。如果中国人也为德国人谈一个民族，那末他们始终想到的是，从一个民族的主张也可以引出适用于分裂的朝鲜和越南以及解决自己的台湾问题的结论。在这点上人们在北京遇到了只有在世界上很少的地方才可能有的强硬的论据。

【时事社东京九月二十一日电】

题：自民党访华团谈印象，中国关心苏联同台湾的关系

应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访问中国二十天后于二十日晚回国的自民党大平派的小山长规等人，二十一日下午在党总部会见记者，谈了通过同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秘书长孙平化和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张香山等中国要人会谈所得到的中国关于苏联对台湾的态度的印象。谈话的内容如下：

一、对“解放台湾是否用和平手段”的问题，中国方面说，“不能排除用武力解放的可能性”。但对于“那么，以何时为限”的提问，中国方面回答说，“总之，现在用的是和平手段”。

二、中国似乎强烈地感觉到了苏联对台湾的兴趣，说苏台间似乎有新闻记者来往。此外，关于苏联舰队通过台湾海峡一事，认为，如果没有得到台湾的同意是不可能的，苏台间是有某种联系的。

三、尽管台湾的蒋介石总统一直主张“一个中国”，但行政院长蒋经国并不这样说。中国认为需要密切注视蒋经国的言行。

【时事社东京九月二十一日电】题：中国方面向自民党访华团暗示，将再次延长日中民间渔业协定

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孙平化最近对应该协会邀请访华的自民党大平派访华团（团长小山长规）说：“关于明年六月到期的日中民间渔业协定，不能说不再延期。”暗示如果日中政府间的渔业协定谈判不能取得进展将考虑再次延长民间协定。

这是于二十日晚回国的小山团长等一行在二十一日向记者招待会上透露的。

据小山团长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正等待一九七五年五月召开的国际海洋法会议的结论，然后决定对日本和中国政府间渔业协定的正式态度。

（上接第二版）

至于食品，最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向他们的专门商店每月一律支付五十到七十卢布的一笔钱。然后他们需要拿多少食品就可以拿多少食品，包括鱼子酱、切得很好的肉，和普通商店里买不到的其他许多食品。这家商店只向最高级的官员开放。另外一些人可以到稍次的专门商店里去购物，这种商店以比较商业化的方式出售稀有食品。据说，有一家这样的商店设在莫斯科市中心高尔基大街第一食品店的地下室内。

特权阶级还配到最好的住房。一个重要的政府官员可能在莫斯科市中心一所宏伟而古老的建筑物里得到五间或六间高敞的房间。

或者，像柯西金总理和至少另外六个人那样，他可能住在列宁山山顶上俯瞰莫斯科全市的一所巨大现代化的公寓住所里，这种住房是专门为纳恰尔斯特沃建造的。

对特权阶级来说，乡村里的住房似乎比莫斯科的公寓住所更为重要。在莫斯科以东的茹科瓦村、鲍尔维哈村和乌斯宾斯科村都分布着要人的巨大别墅——用砖或木料造的两层楼房，外面有宽敞的场地，四周围以高高的篱笆。这些村庄中的汽车道和小路上经常挂着欧洲式的“禁止入内”的牌子——红盘上一块白砖。

政治局委员在这个地区都有别墅，在更僻远的地区还有官邸。据

说，有许多委员拥有打猎小屋。大多数，很可能，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在黑海海滩上还有别墅。较低级的官员也享有这种好处。

服装是在专门商店里买的，由专门的裁缝裁制。戏票、火车票、飞机票也都是在专门的票房出售。看病在专门的诊疗所和医院里看。据说，莫斯科郊区鲁勃利奥夫斯科埃公路上的克里姆林宫医院是全国最好的医院。它里面的药品和设备是普通医院里从来见不到的。

硬通货商店是一个赐予特权的途径。这些商店叫做“白桦树”商店，它们接受代表硬通货的票券。凡有亲戚在国外并从国外得到汇款者可获得这种票券，而不是现金。

在苏联驻国外的使馆工作的外交官被鼓励把他的一些薪金换成票券。

白桦树商店有明显的标记。在莫斯科有七家这样的商店。用这种票券可以买到食品、服装、家具和器皿。每天，有许多普通老百姓偶然闯到这种商店想走进去。每家白桦树商店门口都有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把门，禁止没有票券的人入内。

白桦树商店里现在挤满了苏联的顾客。并不是所有的顾客都从国外得到硬通货。

某些机关用票券支付他们的职工，即便他们是在莫斯科工作。在

苏联新闻社工作的一个年轻记者向一个外国朋友吹嘘说，他经常分到一些票券。

一个美国外交官有一次在硬通货自动售货市场购买食品碰到了一个苏联保安人员，此人常常被委派来尾随这个外交官。

并不是所有的特权都表现于可以进入专门的商店和专门的住房。苏联社会中少数特权分子享有的某些好处并不那么具体。这些好处还牵涉到人们对当权派的唯唯诺诺。这一点象在沙皇俄国一贯的那样，似乎已成为现代苏联的特点。

某个人在某个领域成名成家之后就可施展巨大影响，只是因为人们已决定要听从他的话。

谢尔盖·米哈尔科夫（一位作家和作家协会的一个负责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家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如要使某一本书得到出版，就需要有势力的人物的支持。他知道如果他能够使米哈尔科夫在一篇给予好评的书评上签名，这本书就可顺利地通过一切关口。他（米哈尔科夫）作为文化界上层的正统代表的信誉是无可非议的，他对一部著作的支持可以几乎确保它的成功。

米哈尔科夫自己的成就也是巨大的。莫斯科知识界成员在谈到按苏联的标准来看是极其富有的某人时，有时候会说：“他象米哈尔科夫一样富有。”

这种本能对政界最上层的成员来说起着非常强大的作用。据说，政治局委员按惯例可以把他们的子女安排到孩子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去工作。大学或研究所同样应要求可以让他们入

学。苏联历史上没有一位高级领导人把实际政权传给子女的例子，但是许多人把依附于权力的各种好处传给了子女。

许多苏联公民认为所有特权中最大的特权就是出国旅行的权利。那些被认为宜于出厂，特别是去西方的人是一种特殊的优秀分子。记者、科学家、贸易机构的代表、学者和一些其他人，这些是台幸见世面的少数人。他们回国时给他们的子女带回了外国的服装、浪漫的传闻和最新的摇摆舞唱片。他们的子女受到他们居住的一所楼里的每个孩子的羡慕。

少数普通公民开始组成旅行团出国旅行——这是对最优秀工人的一种报酬。但是只有数目很少的一批人到西方去。

在意识形态上，看来特权制同苏联正在建设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这种想法是相对立的。但是在旁观者的眼里一定存在着这种矛盾，而这里掌权的人似乎并不认为有什么不是之处。

也许，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特权制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造成的鸿沟。

科尔就其访华答西德《世界报》记者问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九月十九日发表赫茨艾兴罗德同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科尔的一次谈话，题为《北京支持德国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政策》。摘要如下：

问：科尔先生，您在北京的会谈中是否得到这样的印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希望美国从欧洲也不希望它从亚洲完全撤走，因为苏联会立即在政治和军事上填补这两个地方的真空？

答：我完全可以证实这一点。中国对美国人从欧洲过大西洋撤回去是不感兴趣的。

问：您会谈的一个突出结果是，按照您的东道主的看法，苏联在军事上直接威胁的与其说是中国，不如说是西欧？

答：中国政府分析了苏联兵力的部署情况。它的结论是：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中国人的看法是，苏联把四分之三的地面部队布置在苏联的西部，只有四分之一在中国边境附近。针对欧洲的重型武器所占的比例更高，而在远程武器方面的比例是五比一。我的会谈伙

伴认为，由此十分清楚地看出苏联威胁的重点。

问：中国曾声明，“社会主义阵营”不再存在。因为苏联用勃列日涅夫主义要求有对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能也对中国）进行军事干涉的权利，中国上述声明是想使勃列日涅夫主义失去凭藉吗？

答：勃列日涅夫主义是推行霸权政策的一种手段，而霸权政策是针对所有各方的。但是我个人并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方面是十分恐慌的。

问：您在北京发现他们对北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抱什么态度？

答：关于北约，可以肯定，北京对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所着力支持的德国官方的政策是很理解的。对东南亚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态度，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是相类似。

问：您能否详细谈谈中国对俄国的态度？

答：在我的印象中，那种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的原因首先在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所作的互相对立的解释。中国人对苏联的霸

权要求的担心也是重要的。

问：您能否说明，是不是北京推行一项独立的德国政策，还是中国使它同波恩的关系从属于他对苏联的政策？

答：两种因素都有。有利于欧洲统一的顺利发展以及因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地位也相应强大，是符合中国政策的长远利益的。

问：波恩能不能奉行一项独立的对华政策，或者说，德国的对华政策是否只能是我们同苏联一方、同美国另一方的关系的反映？

答：如果我们同北京的关系只是我们同其他国家关系的反映，那末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这对我们的美国朋友来说是根本不适用的。至于同苏联的关系，由于我们在地理上与苏联接近而产生种种问题，我们不能让任何人，也不能让莫斯科来规定我们同谁发展友好关系。

问：中国想和欧洲共同体建立更密切联系的愿望向您提出了没有？

答：北京是这样想的：欧洲国家越是用一个声音说话，对中国来说就越好。

问：因为中国不相信苏联的缓和政策，它是否想对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施加影响？

答：我认为，这不是德国的政策的有价值的起点。我们的起点应该是：赞成缓和，同时尽一切力量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同我们的北约朋友，尤其是美国的密切联系来保障我们的安全。我们在北京获得了对这一点的谅解。

问：中国对德国和欧洲具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答：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在这里用何等决心采取了象德国政策那样的同样的立场。大概可以说，除了在北京之外在欧洲很少几个地方听到了热烈赞成欧洲立即一体化的意见。第二个要点是一个德意志民族的问题。北京主张一项不折不扣地符合我们利益的政策。如果中国人也为德国人谈一个民族，那末他们始终想到的是，从一个民族的主张也可以引出适用于分裂的朝鲜和越南以及解决自己的台湾问题的结论。在这点上人们在北京遇到了只有在世界上很少的地方才可能有的强硬的论据。

【时事社东京九月二十一日电】

题：自民党访华团谈印象，中国关心苏联同台湾的关系

应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访问中国二十天后于二十日晚回国的自民党大平派的小山长规等人，二十一日下午在党总部会见记者，谈了通过同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秘书长孙平化和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张香山等中国要人会谈所得到的中国关于苏联对台湾的态度的印象。谈话的内容如下：

一、对“解放台湾是否用和平手段”的问题，中国方面说，“不能排除用武力解放的可能性”。但对于“那么，以何时为限”的提问，中国方面回答说，“总之，现在用的是和平手段”。

二、中国似乎强烈地感觉到了苏联对台湾的兴趣，说苏台间似乎有新闻记者来往。此外，关于苏联舰队通过台湾海峡一事，认为，如果没有得到台湾的同意是不可能的，苏台间是有某种联系的。

三、尽管台湾的蒋介石总统一直主张“一个中国”，但行政院长蒋经国并不这样说。中国认为需要密切注视蒋经国的言行。

【时事社东京九月二十一日电】题：中国方面向自民党访华团暗示，将再次延长日中民间渔业协定

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孙平化最近对应该协会邀请访华的自民党大平派访华团（团长小山长规）说：“关于明年六月到期的日中民间渔业协定，不能说不再延期。”暗示如果日中政府间的渔业协定谈判不能取得进展将考虑再次延长民间协定。

这是于二十日晚回国的小山团长等一行在二十一日向记者招待会上透露的。

据小山团长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正等待一九七五年五月召开的国际海洋法会议的结论，然后决定对日本和中国政府间渔业协定的正式态度。

（上接第二版）

至于食品，最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向他们的专门商店每月一律支付五十到七十卢布的一笔钱。然后他们需要拿多少食品就可以拿多少食品，包括鱼子酱、切得很好的肉，和普通商店里买不到的其他许多食品。这家商店只向最高级的官员开放。另外一些人可以到稍次的专门商店里去购物，这种商店以比较商业化的方式出售稀有食品。据说，有一家这样的商店设在莫斯科市中心高尔基大街第一食品店的地下室内。

特权阶级还配到最好的住房。一个重要的政府官员可能在莫斯科市中心一所宏伟而古老的建筑物里得到五间或六间高敞的房间。

或者，像柯西金总理和至少另外六个人那样，他可能住在列宁山山顶上俯瞰莫斯科全市的一所巨大现代化的公寓住所里，这种住房是专门为纳恰尔斯特沃建造的。

对特权阶级来说，乡村里的住房似乎比莫斯科的公寓住所更为重要。在莫斯科以东的茹科瓦村、鲍尔维哈村和乌斯宾斯科村都分布着要人的巨大别墅——用砖或木料造的两层楼房，外面有宽敞的场地，四周围以高高的篱笆。这些村庄中的汽车道和小路上经常挂着欧洲式的“禁止入内”的牌子——红盘上一块白砖。

政治局委员在这个地区都有别墅，在更僻远的地区还有官邸。据

说，有许多委员拥有打猎小屋。大多数，很可能，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在黑海海滩上还有别墅。较低级的官员也享有这种好处。

服装是在专门商店里买的，由专门的裁缝裁制。戏票、火车票、飞机票也都是在专门的票房出售。看病在专门的诊疗所和医院里看。据说，莫斯科郊区鲁勃利奥夫斯科埃公路上的克里姆林宫医院是全国最好的医院。它里面的药品和设备是普通医院里从来见不到的。

硬通货商店是一个赐予特权的途径。这些商店叫做“白桦树”商店，它们接受代表硬通货的票券。凡有亲戚在国外并从国外得到汇款者可获得这种票券，而不是现金。

在苏联驻国外的使馆工作的外交官被鼓励把他的一些薪金换成票券。

白桦树商店有明显的标记。在莫斯科有七家这样的商店。用这种票券可以买到食品、服装、家具和器皿。每天，有许多普通老百姓偶然闯到这种商店想走进去。每家白桦树商店门口都有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把门，禁止没有票券的人入内。

白桦树商店里现在挤满了苏联的顾客。并不是所有的顾客都从国外得到硬通货。

某些机关用票券支付他们的职工，即便他们是在莫斯科工作。在

苏联新闻社工作的一个年轻记者向一个外国朋友吹嘘说，他经常分到一些票券。

一个美国外交官有一次在硬通货自动售货市场购买食品碰到了一个苏联保安人员，此人常常被委派来尾随这个外交官。

并不是所有的特权都表现于可以进入专门的商店和专门的住房。苏联社会中少数特权分子享有的某些好处并不那么具体。这些好处还牵涉到人们对当权派的唯唯诺诺。这一点象在沙皇俄国一贯的那样，似乎已成为现代苏联的特点。

某个人在某个领域成名成家之后就可施展巨大影响，只是因为人们已决定要听从他的话。

谢尔盖·米哈尔科夫（一位作家和作家协会的一个负责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家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如要使某一本书得到出版，就需要有势力的人物的支持。他知道如果他能够使米哈尔科夫在一篇给予好评的书评上签名，这本书就可顺利地通过一切关口。他（米哈尔科夫）作为文化界上层的正统代表的信誉是无可非议的，他对一部著作的支持可以几乎确保它的成功。

米哈尔科夫自己的成就也是巨大的。莫斯科知识界成员在谈到按苏联的标准来看是极其富有的某人时，有时候会说：“他象米哈尔科夫一样富有。”

这种本能对政界最上层的成员来说起着非常强大的作用。据说，政治局委员按惯例可以把他们的子女安排到孩子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去工作。大学或研究所同样应要求可以让他们入学。

苏联历史上没有一位高级领导人把实际政权传给子女的例子，但是许多人把依附于权力的各种好处传给了子女。

许多苏联公民认为所有特权中最大的特权就是出国旅行的权利。那些被认为宜于出厂，特别是去西方的人是一种特殊的优秀分子。记者、科学家、贸易机构的代表、学者和一些其他人，这些是有幸见世面的少数人。他们回国时给他们的子女带回了外国的服装、浪漫的传闻和最新的摇摆舞唱片。他们的子女受到他们居住的一所楼里的每个孩子的羡慕。

少数普通公民开始组成旅行团出国旅行——这是对最优秀工人的一种报酬。但是只有数目很少的一批人到西方去。

在意识形态上，看来特权制同苏联正在建设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这种想法是相对立的。但是在旁观者的眼里一定存在着这种矛盾，而这里掌权的人似乎并不认为有什么不是之处。

也许，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特权制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造成的鸿沟。